

总统身后

——从杜鲁门到里根

[美] 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 著
顾学稼 敖 凡
曾令富 徐跃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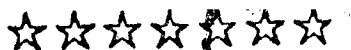
总统身后

——从杜鲁门到里根

[美] 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 著
顾学稼 敖凡 曾令富 徐跃平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孙毅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杨潮

总统身后

——从杜鲁门到里根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1.625 插页 5 字数 267 千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1655-7/K·222 印数: 1—4,000

定价:7.80 元(平装)

中文版序言

《总统身后》(原著书名为 **In the shadow of FDR**——译者)一书已由顾学稼等君译出,对此我颇感欣慰。我还由于有机会向中国读者致以热情的问候而高兴。虽然我和赛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以及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合著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一书的中译本已在十年前出版,但《总统身后》则是由我单独写作,而又有幸被译成中文的第一本书,对于顾学稼等君及其努力,我深表感谢。

《总统身后》一书之所以特别适宜于享有此种殊荣,是因为我在写作此书时,曾广泛地阅读了有关中国的历史。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回忆起当我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时,我的老师奈特·比格斯塔夫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虽然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坚持认为它将万世永存,并保存了详细的档案,以便其后继者可以正确地撰写其历史。所以像“影子”(指原著中的 **shadow** 现象——译者)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现象中,是很易得到理解的。

自拙著的最新版本在美国问世以来的短暂时期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不断投下他的身影的材料仍在继续积累。1989年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主张他的政党应当以罗斯福为榜样，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本世纪中任职的最讲求实际的人。他并没有把纲领与原则混淆，也没有在纲领不能实现时就随便加以放弃”。哈维·甘特是一位赢得民主党提名的黑人候选人。他于1990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参议院席位的竞选中，强调指出罗斯福的诸如学生补助费和联邦住房津贴之类的纲领曾使他的家庭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贫困环境中，有可能得到改善。甘特说：“我认为政府是可以起作用的……而我感谢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人的努力，他在30年代把这个国家从接近于经济上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当前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最近承认“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使人感到……一种与其他的总统相似之处”。而且他和他的同僚们曾不止一次地把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联系在一起。在布什上任最初几个星期里，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曾声称：“总统要比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入主白宫的任何人都拥有一种更接近于罗斯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整个政府里和整个国家里都有他可以调得动的朋友和可以信赖的人。”

然而，抨击布什的人则对把他说成是另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观念加以嘲笑。其中之一辩称：“布什先生的政治菜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间的关系，正如同妈妈小馆的帐单与豪华的卢特斯酒家（在纽约的一家极其昂贵的高档餐厅）的帐单之间的关系一样。”布什自己有时候也否认此种密切的关联。当他于1990年在赫尔辛基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上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认为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头头有了个人间的

了解，倡导者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评论家们指出，罗斯福先生乐观地期待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共同工作，是何等地错误。但是……布什为反对把他与罗斯福类比而进行辩解。”然而，应当看到，甚至在布什反对人们把他和罗斯福相比时，他仍然逃避不了此种比较。在布什担任总统的第一百天时，我确实穷于应付新闻记者们的电话，他们询问，布什的第一个一百天和罗斯福相比到底怎样。

从布什任职之时开始，罗斯福的影子就笼罩在他身上。就在1989年1月布什第一次进入白宫的那一天，《纽约时报》的一位幽默的专栏作家对他开玩笑地想象，如果是布什，而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总统的话，也许他会这样来发表1933年的就职演说词：

首先让我以坚定的信念断言，任何一个认为我们应当为恐惧之类的事物——或者甚至是恐惧本身之类的事物——而焦虑的人，在这个政府中是没有位置的。你们听到过一百天、一百天之类的事。

好吧，我的朋友们，不会再有任何的一百天，或者任何的两百天，或者任何的三百天，我要像我所知道地那样清楚地说，请注意听我说——没有三百天。

因为，我的朋友们，何必着急呢？我们确实在经济方面、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大萧条之类方面运气不佳，但是，我们经历了罗纳德·里根在任的整整八年，也闯过来了，甚至里根的那一套，所以，也许上帝，或者，你们知道，老天爷是很帮我们的忙的。所以，让我们稍微放慢一点步伐……

如果某些作家还在对布什是一个再生的罗斯福此种看法付之

一笑的话，那么很少人会怀疑罗斯福目前仍然投下了一道长长的身影——不只是在美国，还及于其他国家，甚至在苏联。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秋季在纽约的外交协会上的讲演中，为了缓和人们对他的国家在改造时期的焦虑的心情，曾把那里的情况与美国在经济大危机时期的情况相比。他说，苏联的经济体制正在进行一次重大的调整，“美国在六十年前也发生过相似的情况”。不可避免会有一些阻力，正如同“一些强大的力量曾试图使罗斯福的改革放慢速度”。然而，困难是如此之大，不只是在苏联，而且在世界各地，所以，他断言：“需要采取某种激进的、大胆的步骤，某种新政。”

当然，罗斯福的影子不再有它过去那样强烈的影响。在布什任职不足半年时，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写道：“新政人物一个又一个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带走了与旧时代相联结的链环，而在那个时代，政府被人们看成是可以用来医治国家的问题的药剂，而不是造成国家的问题的根源。”他提到的刚刚去世的人们中的一个，是罗斯福最热心的追随者之一的众议员克劳德·佩珀，“他们构想中的联邦政府是具有把千百万人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制服威力强大的河流，使它有利于发电和灌溉，和赢得反对法西斯、反对贫困或疾病的战争的使命和能力的政府。而这种构想已和他们一样地成为过去。”他得出结论说：“他们确实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象征。”

可是，伴随着布罗德的专栏的一幅漫画却带来了一个不同的信息。在这幅画中，佩珀由一位天使陪伴着，在一架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登上天堂。在他更靠近天国时，佩珀说：“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他们在那儿为穷人和老年人所做的一切的最新情况，包括住房、交通、医疗津贴和社会保障。”而伴随他的天使回答说：“克劳德，我们

马上就进行。”只要在美国,或者在世界上其他什么地方,还有那些关心和要求由国家来满足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的人,罗斯福就会继续投下他的身影。

威廉·E·洛伊希滕堡

于缅因州贝莱岛

1991年7月

序 言

1939年夏季，我十六岁时，刚从纽约市昆斯区一所规模颇大的中学毕业。虽然一心想去康奈尔大学，但也只好在今后四年中，搭乘地铁去一所市立大学就读，并住在那象囚室般的公寓房子的家里。康奈尔大学的学费是每年400美元，不论老天怎么帮忙，也不能指望我的家庭提供这个数目。然而，8月初，当我从特拉华河谷我的祖父母的农场中短期休假归来时，我发现信箱里塞满了中学老师给我的贺信。一个信封中附有一张剪报，宣布我已获得校董会的每年100美元奖学金，为期四年。从另一个信封中掉出了另一份剪报，说我是昆斯区获得康奈尔大学奖学金的六名学生之一，为期四年，每年200美元。一夜之间，我就有了我希望得到的数目中的300美元。但是，如果我无法筹措到剩下的100美元这个难以应付的数字，则我仍然看不到卡犹格水面上的校园。当时已是夏季之末，虽然工作难以寻觅，我仍找到了一个在森尼赛德的街道上蹬车出售快乐牌冰淇淋的工作。

不幸的是，快乐牌要卖一毛钱一支，这是任何其它牌子的冰淇淋雪糕的两倍。在经济大萧条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大部分人都嫌它

太贵而不敢问津。我日复一日地从清早到天黑蹬车叫卖，而距离我的目标仍尚远。我的冰淇淋箱在我回来时，经常和我出去时装得几乎一样满，而去伊萨卡注册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了。

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大热天，一个开着出售快乐牌冰淇淋卡车的中年人，特意地停下来告知我，在市镇最远的一端，聚集了一大群空肚子的人——因为他们期待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来主持昆斯大道延长线路工程的揭幕典礼。我蹬着自行车走过了许许多多街道，到达现场后，车上的冰淇淋雪糕销售一空。这一天的收入刚好使我挣到足够的钱来缴纳康奈尔大学的学费。在一个值得记忆的秋季早晨，我出发前往伊萨卡。

甚至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加上家庭慷慨和竭尽全力的帮助，在大学中我仍需半工半读才能应付，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然而，到达校园之后，就有人告诉我，罗斯福建立的机构之一全国青年总署可以提供工作机会。在到达康奈尔大学的第一天，我就被派去清洗试管，每小时工资为30美分。自此以后，在我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年代里，全国青年总署一直支持着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罗斯福总统，不论是在那年夏季的昆斯大道上（因为我在一大群拥挤的人们的外缘），或者是在任何其它时候。但是，在1939年9月，我象数以百万计的从未见过他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影响；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个月里，新政和他所引导的外交事务，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980年春，我回到康奈尔大学去考察罗斯福的影响——并非他对全国，而是对以后入主白宫的民主党人的影响。我荣幸地被邀请主持贝克尔讲座，这是以杰出的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命名的讲座。1939年时，还可以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他。此后数

日，我讲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林登·B·约翰逊的含义。此后两年，我又从大量的原稿中，特别是从海德公园村、独立城、波士顿和奥斯汀的总统图书馆中所获得的资料，来扩大我的叙述。此外，在我为了找寻资料而去一些档案馆，如阿比林的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等之后，我又写了罗斯福对我在康奈尔大学未曾讨论过的那些总统的影响。有关罗纳德·里根说得也不少。在我主持贝克尔讲座时，他还差好几个月才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呢。

罗斯福对于大部分后继者来说，是一个使人畏惧的精灵。就象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所描述的霹雳岛之神一样，罗斯福在逝世后不久就变成了某种神祇。虽然罗斯福并没有被人暗杀，但他常常被人们看成和林肯一样——一尊为了自己的人民而献出生命的神。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在某些方面，他甚至仍然被认为是总统，很有点象中世纪法国的国王一样，在死后，哪怕是很短一段时间内，仍被认为是继续在位。1945年5月，在巴西的伊塔马拉提，在向罗斯福致敬的仪式上，阿道夫·伯利大使说：

伟人们有两重生命：一重生命在他们在世上工作之时；第二重则从他们去世之日开始，并且在他们的思想与观念仍然极有影响时，一直继续存在。在这第二重生命中，早些时候发展的观念，无限期地对人们与事件施加着影响。现在，在他去世仅仅一个月后，我看到了他的第二重的，也许是更伟大的生命的开始。我们之中，谁也无法预见到它的结果将是什么；但很少人会否认有一个继续存在的仁慈心灵，不停地在向痛苦中的世界讲话。

20多年之后，《时代——生活》杂志的通讯员休·赛迪在记述一次吸引了不少华盛顿名流参加的纪念罗斯福的聚会时说：“在

1967年2月的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当你站在白宫的东厅里向许多面孔望去时，会突然理解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仍然主宰着华盛顿。他的思想继续存在，他的人马也依然存在。和任何其他个人相比，目前在运转的政府，更多地是他的创造。”赛迪从白宫中记述说，“你从广场往下看，可以见到耸立在那里的许多联邦大厦，它们都是那位了不起的人物的纪念碑……已经发生了这样许多的事，而且还有这样许多的事物同样如此。”

在许多重大的方面，罗斯福在他的后继者身上留下了标志。在他之后的四位总统中的三位——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他们都是他提拔起来的。而另一位，肯尼迪，则是在罗斯福任命他的父亲担任高级职务时，才初次熟悉华盛顿这个地方。在罗斯福之前，没有人曾经象他那样，在执政的日子里，对政治生活具有如此巨大的统治力量。如果找不到更好的理由的话，那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在白宫里呆得那么久。在这个过程中，他创造了他的每一个后继者都要应付的局面，即行政首脑应是时代的主要塑造者。他遗赠给后继者的，不仅是新政的遗产，还有全球外交政策的遗产，以及所有在他作为争取战争胜利的指导者的年代里，出现的那些机构。罗斯福时代为战后时期的大部分年份安排好了日程，其争论点只是集中在诸如物价的控制是否应当加以维持；社会保障应当扩大到怎样的限度；最低工资应当提高到怎样的水平；公共权力的领域应当扩大到多大的范围等问题上。在罗斯福去世已久之后，新政的机构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继续按照他第一个任期中起草的条例在管理，而公平施政、新边疆、和伟大的社会等纲领，无不是从罗斯福的实验中大量吸取经验的。

西奥多·怀特曾这样说过，“一切当代的全国性政治活动，都

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的。”罗斯福作为 80 年来第一个以选民多数票进入白宫的民主党人，帮助形成了美国政治格局基本上的重新调整。他创造了“罗斯福联盟”，把可靠的南方这一传统民主党实力的源泉，和大城市中的低收入的种族集团结合起来，并如某一调查曾发现的，吸引那些赞成走向现代化的 20 世纪潮流的“世界主义者和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人”。在 1944 年罗斯福的最后胜利之后，没有哪一次选举中，南方仍是可靠的，联盟也在一些其它方面破损了。然而，迟至 1980 年，一位观察家注意到了两位敏锐的研究选举的专家曾“把罗斯福联盟的死亡与纽约市剧院的死亡相比。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听到有关其死亡的谈论。但是，如果你大胆走到曼哈顿的剧院区去，灯火依然辉煌。罗斯福的联盟也是如此，在 47 个月来，我们听到的是它正在怎样地分裂，然而到了选举日，急急如令，它依然存在”。

罗斯福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建筑师，鼓励了此后的民主党总统，甚至某些共和党人也去与罗斯福攀上关系。他们击退那些自称是罗斯福的真正继承者的冒牌货色，以罗斯福的形象进行竞选，并且年复一年地引述罗斯福的讲话。他们任命一些曾在罗斯福手下服务过的人，在他们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并且使用罗斯福处理问题的方法，来应付他们的时代中的问题。

他们做这一切，不只是出于坚定的信念，也是出于需要，因为他们有一种很生动的、被人们注视着的感觉。他们知道自己的表现正被一批视察人员监督着，防止出现对真正信念有任何偏离的征兆。这批人里有罗斯福夫人，她的行为有时有点象中国的皇太后；有已故总统的几个儿子，他们对罗斯福留下的传统也有自己的看法；还有 30 年代杰出的青年人，他们在 80 年代仍然可以提出许多忠告；以及很大一批自由派积极分子，对于他们来说，罗斯福是一

尊偶像。

这些批评家们要求的，并非是罗斯福的后继者能否适当地处理当代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否干得同罗斯福一样好。还要求他们不只是引述罗斯福的话和重复他的政策，而是要以显而易见的热情来做，不但要顺利完成一个相似规模的纲领，还要以同样的才华来完成。每个人都被期待着有一个牌号——就象 **FDR**^①这样的缩写那样被人们所熟悉，并成为象“新政”那样的口头禅的鼻祖。当他们竞选公职时，人们要问为什么他们远远赶不上那位伟大的竞选者。在每一位继承者的第一个一百天结束时，观察家们就要把他们的政绩和罗斯福的相比。甚至他们的妻子也会被要求按照埃莉诺·罗斯福的标准来肩负责任。

固然，在此后数十年间，美国总统的大部分任务很少或没有借鉴于罗斯福的。肯尼迪或约翰逊之类在对紧迫任务作出反应时，常常没有想到过罗斯福。每个人都依靠他自己的本能，或者受到罗斯福去世以后很久才出现的那些力量的驱使。罗斯福也并不是唯一被回忆起的前任总统。我们只要举出林登·约翰逊所宣称的，他“每晚与林肯一起散步”，就可以确定还有其他的行政首脑，其影响也是直接有关的。哪怕是直接的引述罗斯福，也不能被认为是他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的证据，因为他的后继人往往只是在形式上引述他的话，而且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有选择地利用他。

而且，战后时期的总统还必须牢记，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看法，公众之间是有深刻分歧的。如果说有一大批对罗斯福加以崇拜的人，则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憎恨他，因为他搅乱了阶级关系；对受到景仰的制度，如最高法院，表现得不够尊敬；创立了一个巨

① 即富兰克林·D·罗斯福全名的缩写。——译者

大无比的国家机构，并把国家引向一场使千千万万年轻人丧失性命的战争。还有许多人不能确定他们对他的看法——他看来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对于仿效他的后继者来说，他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模范。1946年时曾建立过一个委员会来核准一项为罗斯福而设立的纪念碑，但该委员会遇到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到1981年夏季，它成了美国历史上为了某一目的而设立的、历时最久的委员会。

虽然如此，没有人怀疑罗斯福是一个多变的人物。从1945年到现在，历史学家都把他和华盛顿、林肯并立；继承他的人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他们要怎样才能比得上罗斯福呢？人们期望他们沿着罗斯福的犁沟前进，甚至做到象那些寻求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恩惠，而显示出孝道或对父母虔敬的人那样。无怪乎他们有时感到很有点象投票放逐阿里斯泰德斯的雅典人，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于听到他被称为“公正的人”。^①

我很高兴有机会来对我在撰写本书时曾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戴维·伯纳尔和托马斯·韦斯特曾耗费了极大的精力来阅读我的手稿，作出了许多精辟的建议。理查德·波伦伯格是我在访问伊萨卡时，最为意气相投的一位主人，他就每一章向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提出了报告。我还受益于下列学者的忠告，如阅读过手稿全文的小奥蒂斯·L·格雷厄姆、杜威·W·格兰瑟姆、托马斯·金斯伯格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阅读过原稿某些章节的迈克尔·贝许洛斯、威廉·H·谢夫、罗伯特·达列克、罗伯特·迪万和理查德·柯肯德尔。

① 阿里斯泰德斯为雅典的将军和政治家，约生活于公元前530—467年间。他的姓氏的意义为公正的人。——译者

在撰写贝克尔讲座的讲稿时，我正在北卡罗来纳的全国人文科学中心担任梅隆高级研究员。我感谢这一时期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协助，其中特别是查尔斯·伯奎斯特、杰弗里·布洛杰特、穆里尔·布雷德布鲁克、约翰·卡森、桑福德·拉科夫、格特鲁德·兰泽尔、迈克尔·罗法洛、戴维·洛温撒尔、斯蒂芬·马库斯、马文·梅耶斯、肯特·马利肯、詹姆斯·奥尔尼、约翰·奥佩、阿柯斯·奥斯托、R·R·帕尔默、梅里尔·彼得森、德博拉和约翰·西特尔、丽贝卡·萨顿、阿伦·塔特尔、约翰·沃尔、爱德华·威廉斯、戴维·威尔斯以及伊迪丝·威施格洛德。

在整个过程中，从各方面给我以帮助的其他人有：黛安·阿伦庇、米德·奥尔康、詹姆斯·L·鲍曼、斯蒂芬·B·巴克斯特、劳森·博林、约翰·W·钱伯斯、艾米·戴维斯、加里·M·芬克、理查德·弗里德、罗伯特·格林、亨德里克·赫茨伯格、哈里·杰弗里，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乔舒亚和托马斯·洛赫腾伯格、彼得·利维、戴维·麦卡洛、卡西·米顿、约翰·芒迪、詹姆斯·帕特森、斯科特·皮茨、小詹姆斯·W·罗、卡西·斯洛博金、莫顿·索斯耶、劳拉·森德林、迈伦·沃尔德曼、克里斯托弗·威廉斯以及伯纳德·威希。

那些在许许多多地方——从南卡罗来纳大学到亚利桑那大学，从史密斯学院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从弗吉尼亚的国会议员斯蒂芬·J·索拉兹的起居室到意大利古老的佛罗伦萨的大厅中——曾经在我的演讲中听到过本书的片段的听众所提出的问题，也使我得益不浅。

劳伦斯·马利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曾对本书表现出一种令人鼓舞的信念。还有大量手稿、档案管理人员，特别是几个总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答复我的询问时，非常有助于解决问

题。

我最为感激的是琼·安妮·威廉斯,她自始至终关心本书,并以她非凡的编辑技巧,对本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改进,她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并在欢庆时共享喜悦。

威廉·洛伊希滕堡
北卡罗来纳 查珀尔希尔